

上海的召喚

季理斐休假歸來，看起來「精神百倍」，¹ 恰逢他首次來華十周年。他的快活樂觀不全是健康恢復的原因，其中祕密將很快被豫北差會知曉。在上海，赫赫有名的廣學會（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）² 總幹事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聯繫到他，邀請他加入廣學會。這是一個令人驚奇和興奮的提議。

李氏早就稱讚季理斐為中國研究學者。他的《英華成語合璧字集》（*Mandarin Romanized Dictionary*）³ 差不多兩年前已出版。由於中國與西方接觸日益加大，漢語新詞必須不斷增添，因此詞典編纂需要長期的工作投入。季理斐的詞典當時無出其右，是研究漢語的無價之寶。

李氏渴望季理斐在廣學會發揮他的才華。1897年夏，他造訪加拿大，請求傳教總部調派季理斐到廣學會。然而，那時麥凱告訴他，季理斐的健康狀況不佳，他因此隱而未發。如今，他直接與季理斐見面。

李提摩太是個有遠見卓識的人。他對廣學會工作侃侃而談，喚起了季理斐追求理想和極其樂觀的本性。廣學會的文字事工在全中國聲名遠揚，還沒有其他傳教機構能贏得大清達官貴人的如此尊重和財政支持。豫北差會很看重它的出版物，李氏曾經送給他們五十本花之安（Faber）的《自西徂東》（*Civilization*），季理斐又將它們送給兩位巡撫和幾位知縣，其反響效果頗佳。還有一次，差會請求季理斐就有關問題諮詢李提摩太，如書刊的印刷和發行策略、每三年一考的科舉考生情況、河南巡撫關於傳教士在其轄區內生活和工作的權利法令等。

季理斐抵達上海時，李提摩太剛從北京歸來。在帝都，他被牽涉進中國歷史長河裏眾多悲劇事件之中。優秀青年維新黨人、總理衙門章京康有為，發電報召他進京。康氏實際上是年輕皇帝的首席顧問，皇帝被他的一些改革熱情打動，一百天內頒布二十七條敕令，力圖在中國實行變法和加速現代化進展。然而，此變革操之過急，幅度也太大，以皇太后慈禧為首的反對勢力迅速反撲。康氏意識到危險臨近，急電李提摩太進京。

李提摩太來時已晚，皇帝已經同戊戌六君子一起被太后監禁。李氏即刻前往英美公使館，強烈呼籲解救這些年輕人，可是毫無結果。新任大英公使從未耳聞康有為，認為沒有任何理由站到皇帝或變法者一邊；美國公使無意干涉內政。六位年輕人，其中一位是康氏的兄弟，全部被砍頭。李提摩太設法幫助康氏和著名學者梁啟超安全逃到天津的英租界。

季理斐被李提摩太深深打動了。見此，李氏講述了廣學會在戊戌變法中起到的作用，廣學會的目標、成就和失敗。從成立之初，廣學會宗旨為：

清除阻礙中國進步的無知和無情，代之以知識和良善，力圖建立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。終極真理，無論是被發現還是被啟示，是自然界、人類生活和上帝至善本性中的神妙之道；服事、和平和進步的終極靈感來源於知曉萬物中存在的神聖法則。⁴

廣學會著名刊物《萬國公報》(The Review of the Times) 一直力促改革：「只有在新的**道德基礎上**中國才能進行徹底的改革，**如果沒有道德根基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健全和長久。**」⁵

他們強調改革必須立足於道德基礎，受到了所有儒家學者的歡迎。康有為和他的弟子閱讀了廣學會書刊，創立強學會，請李提摩太擔任他們的非官方顧問。

1894-95年中國敗給日本的恥辱，進一步使改革派相信李氏主張的正確性，對西學的興趣日益漸長。中國報紙有意歪曲報道戰事，愈來愈多的人閱讀廣學會的刊物以瞭解真相。戰後，廣學會出版了八卷林樂知博士(Dr. Young Allen)撰寫的《中東戰紀本末》(*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*)。此書不僅僅關乎歷史，而是以議和談判開始，以兩卷關於教育改革結束。書中分析戰爭起因和戰敗原由，吹響了喚醒東方睡獅的號角。這部書很快銷售一空，不到六個月就收回了成本。

維新改革派吸引了年輕皇帝的興趣，康氏被請入皇宮，他抓住機會向皇帝呈遞一百二十九本廣學會出版物及一本聖經。皇帝如飢似渴地閱讀這些出版物，邀請李提摩太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顧問，處理一切與傳教有關的事務。李氏婉拒皇帝的委任，覺得他最好獨立開展工作。他力勸維新派謹慎行動，盡力贏得保守派支持。然而，年輕人能等待嗎？三個月期間，康有為將青年維新派聚集在皇帝身邊，日復一日向皇帝灌輸急需徹底改革的信念，皇帝由此頒出一百條敕令。反對變革的勢力重佔上風，康有為急電李提摩太。

李氏向季理斐強調，他相信假如當時廣學會有更多的人手來提高中國對西方的認識，維新變法會有一個不同的結局。然而，他仍抱有堅定信心，變法的失敗雖推遲了改革的步伐，但不能終止改革進程。廣學會仍有發揮作用的餘地，不過必須擁有更多的富有才識的傳教士。季理斐願意入夥嗎？

從上海返回河南的漫漫長路上，季理斐腦海中想的全是廣學會取得的傑出成就，以及文字工作帶來的無窮機會。天哪，一個傳教士，通過書刊，可向一百萬中國人佈道！他帶着在「這一代」實現中國基督教化的崇高理想來華，結果卻發現福音傳播速度太慢。難道這是答案嗎？李提摩太曾說過，變法失敗那年前，社會對他們的書刊需求非常高，以致上海出版社供不應求。《中東戰紀本末》不是唯一賣得好的書籍。麥肯齊 (Robert MacKenzie) 的《泰西新史攬要》(*History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) 銷售更為火爆，第三版刊行之時間恰好在「百日維新」前兩周，兩周之內便售出四千冊。在季理斐回到河南以前，他的心早已留在上海了，然而，他還未跟差會籌謀商量此事。

不久，正式調函抵達。其收件人是季理斐，可他將它轉交給豫北差會，其措辭顯示了廣學會的一些特點：

我會委員會獲悉你極具文字天賦，指示我寫信詢問你是否願來上海入駐我會，條件與林樂知和我一樣，即你為所有差會的利益作工，人事關係仍留在豫北差會，並由他們支付工資。中國正在經歷一次極不尋常的危機，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後果，因為危機將帶來政治、教育、商業、製造業、社會和宗教等本質的改變。⁶

一想到即將失去最優秀的學者和最勤勉的工人，豫北差會大為震驚。上海距離太遠，交通既慢又難，即使他名義上仍屬差會，實際上等於失去他。

季理斐清楚表達了他想去廣學會的意願，向差會全面地概述了理由。差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徵求意見，委員會提出了四個季理斐

應該留在河南的理由。第一，豫北差會尚未度過初創期，無法出讓這樣一位有經驗且有才幹的弟兄；第二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季理斐具備與文人和官府打交道的能力，而在豫北，這種交道將會愈來愈多；第三，在彰德，季理斐在從事文字工作的同時還能夠為差會服務，但在上海他卻無法兼顧二者；第四，面對幅員遼闊的河南和不少傳教士離開的狀況，我們一直在呼籲新傳教士到來，因此出讓如此優秀的一位工人顯然不太適宜。

豫北差會同意上述報告並補充：「雖然我們強烈反對我們的弟兄離開，但是必須尊重他自己的願望。如今，我們敬請總部考慮，並且耐心等待結果。」⁷

差會祕書轉交這份決議時寫道：

這是差會難以決定的一個問題，因而將此交給總部定奪。不用說，我們對季理斐兄弟的離開深感不捨，可是又擔心，挽留他是心胸狹窄或自私的表現。⁸

顯然，差會祕書期望總部支持季理斐赴任。這裏，他代表的是個人意見。

直到召開區會後兩個月，季理斐才寫信向傳教總部提起邀請函的事，並給出了自己願意加入廣學會的四個理由。第一，自己在語言方面的訓練和才能似乎在廣學會更有用武之地。第二，相比資格或許更高的其他同事，單身的他換工作地方更方便些。第三，他仍然可以對五萬說官話的上海人佈道。第四，過去他的健康狀況甚差，變換環境也許能使自己身體恢復健康。其中，他還對差會挽留他的理由作辯解。要做好文字工作必須要有圖書館，而只有上海

才有這樣的圖書館。很大程度上，目前差會已渡過初創期。毋庸置疑，他在上海或許能影響到更多的文人和官員。

此外，他現在接任這項工作還有一個更具說服力的理由。寫信前，他徵詢了一些老一輩傳教士領袖的意見。他們一致同意，文字工作在這個時期最為緊要。

雖然遇到一些抵觸，但是文字工作肯定能喚醒人心。誰能估量文字在這千載難逢時期發揮的作用呢？時機若錯過，也許需要幾百年才能挽回忽略關鍵時刻而造成的損失。⁹

李提摩太也寫信向傳教總部強烈呼求。他在信中闡述廣學會的宗旨，即通過詳細闡釋基督宗教和其教義，以及它對個人和國家的果效，啟發教化帝國領袖人物。印刷書刊能影響這些領袖，使：

一人能向百萬人佈道，而不是站在街邊禮拜堂向幾百人佈道，同時為全國其他同行弟兄打開大門。另一方面，假設我們不從事文字事工，那麼將會延長我們的傳教士和信徒的受逼迫和磨難的時期。其次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勞動分工和獲取效率的最佳手段。一些傳教士秉承超羣的傳道天賦——那就讓他們從事傳道的事工。一些秉承教導天賦——那就讓他們從事教導的工作。一些秉承文字天賦——那就讓他們從事著書的工作。我們的朋友季理斐秉承文字天賦，若他在最適合他的地方工作，發揮的作用豈不更大？我並不想讓（其他事工）任何人才埋沒，但與此同時認為，倘若我們重視文字這個最重要的事工，其他事工的成

功機會將增加十倍（謙虛地說）。從事其他事工的傳教士估計有成千上百，而從事文字事工的卻屈指可數！當我們知道文字蘊含的巨大力量而卻投入太少時，我們應該認罪懺悔（cry Peccari，拉丁語）。我們所請求的不是將好朋友季理斐的服事引導至用途較小的管道，而是數倍地發揮他的所長。¹⁰

誰能拒絕這樣的請求呢？傳教總部以全票通過季理斐的調動，只等他自己和總會的同意。《威斯敏斯特報》大力讚揚傳教總部的舉動，確信此舉將：

把重生和福傳事工告訴全世界，遠遠超過傳教總部或母會能估量或理解的範圍。中國人不能單靠口頭佈道獲得重生。他們需要具備文字天賦的人才提供基督教文學，以滿足對西方知識的巨大新需求。新文學將決定新中國的性格。讓中華歸主吧。為此目的，廣學會如今已經深深影響了清帝國的精英階層。¹¹

調函對差會和母會皆帶來極大的榮譽。很長時期，傳教總部沒能取得突出的成績。他們向季理斐、豫北差會、傳教總部、聖雅各教會信眾和全體教會表示祝賀。幾天後，總會簽署了任命書。

這期《威斯敏斯特報》到達河南，第一時間帶來派遣季理斐去上海的消息。這樣一個有悖於差會統一意見的決定如何做出的呢？當然，季理斐沒參與討論。差會成員要求出示他寫給傳教總部的信件副本，可他未留副本。由於秘書在海濱休假缺席，河南區會主席向多倫多寫信，請求查閱促成最終決定的所有信件。

差會 10 月開會時，沒有收到多倫多那邊的回信。他們相當不情願地解除了季理斐在河南的工作，讓他可以自由地去上海。但是，差會想保持管理其成員的權利。他們重申，季理斐從事大量文字寫作的同時，仍然能夠為差會提供有價值工作。他們對季理斐在上海的工作將不承擔督導責任，但同意了他保留差會成員身分的請求。

然而，直到他收到差會的祝福（雖然是有限的）後，他才離開河南：「我們向季理斐致以最誠摯的問候。假若他充分實現了他未來事工的目標，我們將為他高興。」¹²

現在，季理斐近十個月來的不確定狀態終於塵埃落定。他可以自由地開始他偉大的畢生志業。如果說他對差會的態度感到有所失望的話，那麼他自身的熱誠和麥凱博士溫暖的理解話語抵消了不少失落：「生命只有一次，你肯定希望最有意義地度過一生。」¹³ 同樣，麥凱向差會解釋，傳教總部全體一致的意見是：「在中國目前的特定時刻，上帝呼召他做的工作至關重要。季理斐擁有文字工作的特殊稟賦，不響應這樣的呼召也許是一個重大錯誤。」¹⁴ 他進而向他們保證，即將儘快派遣新工人奔赴河南。祕書回信道：「我們認為季理斐以一當十，需要不少增援才能填補空缺。」¹⁵

若季理斐看到此信，將會欣喜萬分。若沒有，也不要緊。目前除了上海，其他皆不重要了。

註釋

1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correspondence, 12/12/98.

2 簡稱 SDK，原名「同文書會」，1892 年中文名稱改為「廣學會」。1906 年其英語名稱改為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(簡稱 CLS)。——譯者註

3 見附錄。

多產作家

得到准許令後一周，季理斐便啟程奔赴上海。此刻他的心已經在思索一項文字工作計畫了。早在差會決定放他前，他就已經寫信給教會領袖，徵詢他們是否需要一本有關聖靈的書。去天津的途中，他在倫敦會傳教站住了一晚，引發了撰寫另一本書的靈感。那裏一個「親愛的弟兄」¹對教會的自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：

那天他撒下一粒種子，在我們啟航後馬上就開花結果。隨着本地船隻緩緩前行，我腦海裏一直盤桓着這事，很快地用英語寫出一個某村莊的自養故事。生動的故事效果遠遠優於講道詞。²

然而，他離開河南時黯然神傷。當他不得不與隨行的費約翰（Mr. Griffith）告別時，他深深意識到，他是永久地離開河南了。費約翰跟他一起從河南出發，目的是護送剛入職的胡德牧師（Rev. T. C. Hood）去河南。

隨着他們的船慢慢駛入內地，我感到一些哽咽，然而，我強忍着悲傷回到住所。離別是憂傷的，不是嗎？因為多年紮下的根很難拔出來，但是迄今為止，發生的每件事皆使我進一步確信：無論如何，這裏（上海）是我目前的工場。³

除了幾次短暫的訪問，他並沒有再次回到河南。

駛往上海的輪船在天津港外的沙洲上牢牢擱淺，使他到達上海的時間延誤了四天。上海坐落於黃浦江上游，當他們抵達江口時，由於急於想到達目的地，他一早起牀，跳入一隻小船上岸，然後搭黃包車走了十英里才趕到市區。黃包車飛奔在平坦的碎石路面上，河南糟糕的路況似乎遠在天邊。

李提摩太「張開雙臂」⁴歡迎他。不久，他就有了一間辦公室和一張書桌，可以自由地專注於他的畢生工作。一切都使他興奮不已：

第一次步入辦公室時，有人指給我地面上一堆十一個省巡撫的包裹。這些高官沒有關閉任何一個禮拜堂或傳教站的大門。我們一直在努力給他們帶來光明。假若我們為這些書禱告，難道上帝不會使用它們來驅散滿清官員頭腦中的黑暗麼？上帝原先通過書籍所行的大能，可以再次彰顯，甚至可說將成就比你預見的更大的事。⁵

很快，季理斐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，兩天內就為《中西教會報》(Missionary Review) (中文版) 寫了兩篇文章，隨即着手翻譯他關於自養的小冊子。在空閒時間，他細讀每本他能找到有關聖靈的書，希望找到一本適合翻譯的書。他不希望此書是學術論文，依他看來，中國人需要的是一本每天都能學習的書——一本激發靈命的實用書籍。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的《基督的靈》(Spirit of Christ) 似乎是合意的最佳選擇，雖然肯定不是最容易翻譯的。一位富有經驗的傳教士學者說過，撼動最堅硬的心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。季理斐毫不泄氣，不久他瞭解到，對中國讀者來說，幾乎每本目標西方的讀物都需要相當多的改寫才行。

《基督的靈》於1902年1月出版。到11月時，銷售量驚人，改寫手法證實是有效的。

廣學會為季理斐找了兩名中國助手。西方譯者向中國助手口述官話譯文，然後，助手把官話改寫成文言文。譯者仔細地逐詞逐句

檢查譯文，以保證其完全忠實於原文。沒有哪個西方譯者能指望單靠自身就能寫好文言文，所以必須常常反覆校對助手的譯稿。季理斐利用這種方式與兩名助手合作，同時翻譯了兩本書。

女王大學校長格蘭特⁶寫的《四教考略》(*The World's Great Religions*)是季理斐翻譯的第二本書。翻譯「一本加拿大人的原著」⁷讓季理斐倍感榮幸，「其中關於儒教的一章尤其必要，因為眾所周知，儒教是傳教士必須努力攻克的堡壘。」⁸

河南省有相當多的穆斯林。他曾經研究過穆斯林及伊斯蘭教，發現格蘭特寫伊斯蘭教的章節令人深思：「在中國，它（伊斯蘭教）是擺在其他眾多障礙之前最難克服的一個。雖然中國有幾百萬穆斯林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傳教士所忽略。傳教士走的是不對抗的路線，而穆斯林卻相反。」⁹該章也以獨立小冊子出版，一位山東傳教士立刻訂購了一百冊。

一年後，季理斐全神貫注於翻譯工作，幫助他的四名助手均忙碌不已。第一名助手早上六時半到達辦公室，到最後一名助手離開後，季理斐還經常工作到深夜。

季理斐感到有必要給祖國的朋友解釋自己調遣到上海的原因：

雖然廣學會向我發出「召喚」，雖然我期待與同事建立最密切的合作關係，但是我不是該會的僕人；我仍然是加拿大長老會的傳教士，上帝面前作你們的僕人。我有行動自由，因此，我感到沒有義務束縛於廣學會的整盤計畫。然而，要解釋的話，首先想想其名字——在中國廣傳基督教及一般知識協會(*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*)

in China)，基督教一詞位於首位，而我相信它已經普及和蘊含在廣學會所有的工作裏。但從我的角度看來，廣學會未能承擔起介紹一般知識……我的目標將是運用基督教文字，正如我迄今運用**我的聲音**一樣，**將上帝的話語傳達給百萬中國人——信基督和被釘十字架的主，除此之外，別無所求。**¹⁰

他認為，三件事可以確保他工作成功。他必須得到一個聖靈默示的信息；他的讀者必須受到啟發而傾聽此信息；他必須不斷地禱告，以便學會士大夫使用的文言文。

廣學會深信，上帝能夠並且將會運用書刊以及傳道者的聲音，迅速地榮耀祂自己的名。而且，該會處於一個很有利的地位。它不是任何一個特定宗派或國家所屬的機構。它是世界性的，不分宗派。職員有英國人、美國人、加拿大人、德國人和中國人，由官員、專業人士和商人選出的代表運營管理。廣學會的國際化性質使中國人排除了對它有隱秘動機的懷疑。

季理斐決心使他的文字工作具有強烈的福音傳道性質。藉由他的書籍，他可以向百萬人而不單單是幾個人傳福音，因為在他離世後，書籍仍能繼續傳道。¹¹

季理斐是在一個關鍵時刻加入了廣學會。保守勢力軟禁了皇帝，處決了改革派領袖，但是他們不能撲滅人們對西學的熱情，也不能使所有文人仇外或仇教。旋即爆發的「庚子拳亂」清楚證明了這點。一些開明的官員拒絕參與，兩位總理衙門的高官在命令殺死所有外國人的聖旨中，將「殺死」一詞改成「保護」，最後付出了